

我有两个祖国

——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杨宪益 /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有两个祖国

——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楊宪益 /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 / 杨宪益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ISBN 7-5633-4229-X

I. 我… II. 杨… III. 戴乃迭—纪念文集

IV. K835.61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089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中核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八里街 310 小区 邮政编码:541213)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0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3 000 定价: 1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

杨 苡

1999年一个初冬的日子，著名英籍翻译家戴乃迭女士（Gladys Tayler）在北京阜外医院终于摆脱了折磨她十年的病魔，默默地离开了这纷扰的人世，留给人们多少遗憾和惋惜——她还是没能等到杨家幸存的亲人们祝贺她与杨宪益结婚满60年的这一天！

她为相濡以沫的丈夫献出了一生，但她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却摧毁了她的健康！在清理遗物时，杨宪益在抽屉里找到一份她未完成的自传草稿，大概还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时写的，以后显然因为著者身体每况愈下，便从此尘封在抽屉里了。

这自传的第一句便提到她母亲当年的警告，即：如果她执意嫁给中国人，一定会后悔的……估计戴乃迭写下这句话时，会忍不住她的眼泪，因为下面的一句话恰恰是“一语便成谶”，这使她

写不下去了……然后是从头开始，冷静地回忆她出生的 1919 年……因此在这里，我也不想重复她母亲不幸而言中的预言。而且，她和杨宪益同甘共苦的近 60 年对于她来说始终是无怨无悔的！

戴乃迭生前常对来访的朋友或记者们用她那娓娓动听、十分熟练的中文微笑着说：

“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对于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英籍女翻译家，我们不能不感谢她把我们祖国历史悠久的文化介绍到国外。为了这一艰巨的翻译事业，她做出了那么多无与伦比的贡献——奉献了一生，耗尽了所有的心血。虽然她本可以做得更多些，但是 4 年的牢狱生涯和以后接二连三的打击终于迫使她永远封笔。今天几乎已无法找到她与杨宪益合作或她单独译出的全部原版书了。有许多在十年浩劫中早已焚为灰烬。即使如今原单位再版过的一部分，也是经过删选，而面目全非。这实在是令人十分惋惜的！但无论如何，广大中外读者将永远缅怀这位与杨宪益历尽艰难，仍然平静地微笑着对人们说“我不后悔”的英国女性！

她绝不会属于被人们遗忘的故人！

目 录

第一编	戴乃迭未完成的自传	/001
	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003
	我的狱中生活	/025
	附: 解救戴乃迭	/029
	一、英国亲友的联名信	/029
	二、英国媒体的相关报导	/031
第二编	戴乃迭文存	/037
	一个西方人对《红楼梦》的看法	/039
	新出女作家湛容及其小说《人到中年》	/043
	《权与法》—— 一个勇敢的、切中时弊的话剧	/050
	《新凤霞回忆录》前言	/057
	《北京的传说》前言	/064
	《神鞭》前言	/067
第三编	此情可待成追忆	/071
	悼亡诗	杨宪益 /073
	此情可待成追忆	
	——记乃迭生前二三事	杨宪益 /075

鸬鹚天

——慰宪益 黄苗子 /082

谢谢你! 戴乃迭 郁 风 /083

雪漫什刹海

——记杨宪益和戴乃迭 郁 风 /086

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 谢谢!”

杨敏如 /094

洋嫂子戴乃迭 黄宗江 /105

一封寄不出去的信 沈 峻 /109

赠戴乃迭 邵燕祥 /111

永远美丽的舅母 赵 蘅 /113

心存无限感念 纪 红 /119

嫁给中国

——戴乃迭的故事 李 辉 /124

我的妹妹——戴乃迭 [英] 希尔达·T.布朗 /139

戴乃迭 [英] 狄利亚·达文 /147

戴乃迭 [英] 比尔·詹纳 /153

戴乃迭 [英] 塞利·沃农 /158

怀念戴乃迭 [美] 戴安娜·拉瑞 /162

附 录

戴乃迭及其译介事业 李 晶 /168

戴乃迭翻译作品目录 李 晶 /180

戴乃迭著述目录 李 晶 /185

后记 徐坚忠 /186

第一编

戴乃迭未完成的自传



我

觉得

我有两个祖国……

1919年我生于北京。当时父母亲都在北京为伦敦传教会工作。父亲 J. B. Tayler 的中文名字是戴乐仁。他和蔼可亲,从来没打过孩子,或大声骂过我们。他在中国担任过化学、物理和经济学教师,帮助创建了工会组织,参加过赈荒救济工作;他还是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的托管人,该款是用于送中国学生赴英国留学的。我们家共有五个孩子,我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伯纳德(Bernard)和哈罗德(Harold),一个姐姐——希尔达(Hilda),下面有一个弟弟——约翰(John)。由于我们同辈的亲戚都是男孩,所以家里的女孩很受重视。希尔达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那时候的中国多灾多难,乡村经济衰败,土匪横行,军阀之间争战不休,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怨恨也与日俱增。我们认识的一位传教士就是被土匪杀害的。父亲有两块手表:一块是金表,他在北京戴;另一块是欧米茄,出门时戴的,我们称之为“爸爸的土匪表”。不过,中国的危难跟我们小孩子毫不相干,我们的生活是平静快乐的。



戴乃迭双亲在中国(20年代)

(注:书中“××年代”均指20世纪)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候的北京城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招牌、富丽堂皇的婚丧队伍、正月十五的花灯、清明节的风筝,还有厂甸活色生香的春节庙会,在那儿花上几个铜子就能买到绝妙的玩具。达官贵人坐着华贵体面的轿子或人力车,一队队的骆驼将煤拉进城来。看见街头宰羊的血流到街沟里,令人害怕又反感,却也够刺激的。就连那铺天盖地的风沙,看着也挺有戏剧性。

城里有些地方臭烘烘的,但街上的铺子和食品挑子上的炉子里还是飘来各种各样诱人的味道。由于母亲认为中国饭菜不卫生,我们就只吃单调乏味的英式羊肉和大米布丁,难得吃顿饺子。我们常常背着她,央求厨子或车夫给我们弄点葱花油饼,那才是美味无穷的。

我记得我们第一个家是在抽屉胡同,一座老式四合院里。我们养了兔子,还培植了一点园艺。有一年,我们从北戴河回来,发现院里的棉桃全都绽了苞,露出了雪白的棉絮,让人十分惊喜。院里还有个沙丘堆。父亲从英国为我们带回一辆童车,希尔达和我就比赛,看谁能第一个从那沙丘堆上骑到走

廊那边。我赢了。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胜利的感觉。

在中国长大的外国孩子通常都能说一口跟当地的中国人一样流利的中国话,但我们却不幸是个例外。母亲不许我们跟中国孩子一起玩,因为她认为他们身上都携带着病菌。由于贫困和医疗条件不足,好多孩子都有沙眼、圈癣或其他的什么病,所以我们只在家里玩。父亲开始在燕京大学教经济学时,我们搬到了海淀的一所大房子里。在那儿,我们的玩伴儿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教师们的孩子。我们在那儿认识的大多数中国成年人也都是会说英语的。

我们跟家里的中国女佣也基本没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有一位英国老小姐照管我和希尔达。她渴望来中国做一名传教



戴乃迭(右一)兄弟姐妹五人与父母

士,但资格不够。因此,伦敦传教会派她来帮助一个传教士大家庭,也就是我们家,——我母亲也是教会的人。我们称她杰西阿姨(Auntie Jessie)。她负责看着我们规规矩矩地刷牙,每天学几页《圣经》,在她的监督下练习缝纫和绘画。有一次,她出门了几天,试图劝一位中国将军信奉基督教。我不知道她成功了没有,但那位先生回赠她几盒美味可口的糕点,有些是玫瑰馅的。我们平时是不许吃甜食的,所以我们发觉这些糕点好吃极了。

难忘的还有北戴河。母亲在海边买了一幢两层小楼。旁边就是一道小海湾,正适于写生。去北戴河是一大远征。我们要带上两个仆人、猫咪、冰淇淋机和大量的贮备用品,因为那儿当时只是个小村子,连小商店都没几家。许多新教教会在那儿都有别墅,女士和孩子们就在那儿避暑——我们有时会在那儿住上三个月。那实在是好时光。做完功课,我们就赤脚到海滩上一起玩游戏,或者骑骑小毛驴,再不就是疯跑。那时的英雄之一是埃里克·利德尔(Eric Liddell)。他当时执教于天津新学书院(TACC),那也是我丈夫后来就读的中学。电影《烈火战车》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赢得一枚赛跑奖牌的。这位最招我们喜欢的叔叔就在海滩上跟希尔达赛跑过。英国国旗在我们花园的旗杆上升起时,我们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我们曾有过的时光是那样快乐,因此我在英国听到筹措基金的传教士们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在中国生活时的艰辛与危险时,简直以为听错了。我认为他们是顽固、怀有偏见的,或多半是虚伪之极的。

不过,那些无忧无虑的夏天要结束了。在燕京校园里冰封的湖面上溜冰,那样令人激动的冬天也不会再有了。

一天早上,我同希尔达跟往常一样,出门去清华的国际幼儿园。路上尘土飞扬——那时候的路不是泥泞不堪就是尘土飞扬。希尔达骑着那辆童车,我骑一辆三人车。我们正起劲地蹬着车,突然被几个大兵围住了。他们从没见过外国小孩骑这么古怪的玩意儿,很友好地问了我们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并不害怕,因为中国人一直对我们挺和气。但他们使我们上幼儿园迟到了很久。这件事报告母亲之后,她大为惊慌。军阀的部队拦截了她的女儿!母亲本来打算让我们在中国再多呆几年的,但在这次经历之后,她带我们回了英国。1926年,我们乘远洋客轮离开了中国。

悠闲的还乡海行是很惬意的。沿途停泊在许多风光旖旎的港口。不过,我们抵达伦敦时,却发觉它十分令人失望。灰暗、阴沉,一股煤烟味,根本没有我们在北京所喜爱的那些五颜六色、鲜活生动的街景和诱人的味道。

在英国,我到柴郡(Cheshire)读了一年的女子小学,接着在七栋区瓦汗斯托堂的一家教会女校当了十年的寄宿生。学校有些老师是极为出色的。我也很用功,赢得了一项国家奖学金。我们的日常生活十分严谨,不过偶尔也有放松。其中有一次是到伦敦去看一场中国艺术大展。看到展品中的绘画和瓷器,我们这些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不禁怅然生起了对童年时代的怀念之情。

1937年,我进了牛津,学习法文。但我学习并不是很用功。大学里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也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



戴乃迭(第二排左二)与中学同学合影

修文斯先生(E. R. Hughes)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协会。他是一位没有学生可带的中文教授,从前在福建做过传教士,跟我父母是朋友。看到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时,他惊骇得无法入睡。他非常积极地为中国流散到西南地区的各大学收集书籍捐助,还组织过一场抵制日货的运动。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对着一群群的女士演说,劝她们别买日本的罐头食品和长筒丝袜——她们应当改穿棉线袜。但我实在不是个出色的公众演说者。我对中国的政治形势也只有模糊的概念,而听我演说的那些家庭主妇态度也颇为冷淡。

他(杨宪益——编者注,下同)是(中国)协会主席。起初我几乎给他吓了一大跳,眼睛细长,脸色苍白,但彬彬有礼。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在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他自己绘制

的中国历朝历代的疆域图。进牛津之前,他已在伦敦呆了一年,创办发行了一份报纸,以使当地的中国工人能了解到战争的形势。跟绝大多数在牛津的中国学生不同,他是高中毕业直接来英国的。他决心学习古典文学,只学习了一年时间的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就通过了牛津的入学测试。但在口试时,主考人问起他的准备时间,却断定他的通过必定是出于侥幸:“我们英国的学生要学七年的古典语言文学呢。您再找人辅导一年吧。”实际上,他将那一年用来广泛阅读了,历史、文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著作都有所涉猎。另外,他还在欧洲漫游。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有趣的同伴。他在英国学生中间有些亲密的朋友,经常跟他们一起喝上几杯。

杨宪益在墨顿学院的一位朋友 B 当时正在追求我,同时杨宪益也对我越来越依恋,我也爱上了他。B 发现,如果他邀请“尊敬的杨”一起出来,我也就会乐于接受他的邀请。他们俩开始来听我的法文课,一边一个地坐在我身旁。一天,导师让我们翻译《罗兰之歌》的片断,他们只好承认自己没准备,只是来旁听的。然而,仅凭这段短短的法文训练,杨宪益后来还是把那首长诗译成了中文。他还曾用中世纪法文给我写过诗,他的确是才华横溢。

此后不久,我攻读的方向就从法文转到了中文。E. R. 修文斯先生大为高兴,因为他现在有了一名攻读学位的学生,他便成了中文方面的讲座教授。我的课本是一些中国古代典籍的节选,有《诗经》、《论语》、《易经》,还有些唐代传奇和佛教书籍。我接触到的作品里,最为晚近的只是截至梁启超,因为修文斯教授认为,现代中国毫无值得学习之处。我认为他根本

没听说过鲁迅。而且他说的中国话是福建方言,不是官话,所以从没教过我汉语口语。学习上没人竞争,我也就不太用功,只管跟“尊敬的杨”一同享受生活:撑一竿轻篙,划一叶小船,去乡间长途漫步,或是去电影俱乐部或剧院……

我们像玩儿似的译出了《离骚》,实际上是杨宪益将中文译成了英文,我又把它改写成了对偶句叙事诗。现在我认为该诗体是极不适于那首浪漫长诗的。译本发表之后,一位学者评论说:“杨氏夫妇译的《离骚》与原作比较,就像复活节彩蛋同一个煎蛋饼那样不同。”确实,我在牛津学到的中文实在是微不足道,后来自己都羞于承认拿过牛津的中文学位。今天的青年汉学家们对汉语的掌握要好得多了。

母亲看过了太多不幸的异国婚姻,极力反对我嫁给杨宪益,尽管父亲认为只要我们俩在精神上和谐就能够白头偕老。所以,一直等到我过 21 岁生日,到了可以自主的年龄,我们才订婚。我还向母亲保证,正式结婚之前,我会先在中国过上半年,看自己能否适应那里的条件。杨宪益也有一定的顾虑。他引用摇篮曲《髻毛儿》里的歌词来形容,说我这样的人应该“坐在软垫儿上,衣着做工讲究,吃的是草莓、糖和奶油”。但在战争时期的中国,生活会非常艰苦。我对这些意见根本不予理睬。哈佛大学向他提供了一项研究经费,但我们俩都想回中国。亲友们试图劝阻我。

有人问我:“杨先生是基督徒吗?”

“不是。”

“他喝酒吗?”

“是的。”